

# 意识形态和乌托邦

## ——论中西交往中中国作为他者的形象建构

□俞 博 [电子科技大学 成都 610054]

**[摘要]** 在异国形象建构中往往存在两种不同的倾向,即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以形象研究的基本方法论为基础,通过对异国形象构建过程中常见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倾向进行本质的分析和研究,可以发现意识形态式的形象和乌托邦式的形象本身就只是一种社会想像,是一种关于他者的文化表述。其只是反映了形象建构者的文化心理,而这种文化心理归根到底还是形成于利己主义的基础之上的。在中西交往过程中,西方人塑造了大量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式的中国形象,通过对西方构建的中国形象以及构建过程背后的心态进行剖析,我们也可以发现和论证这两种倾向的文化利己主义特点。

**[关键词]** 异国形象; 意识形态; 乌托邦; 利己主义

**[中图分类号]** G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8105(2010)05-0067-04

关于形象学研究中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法国学者让-马克·莫哈(Jean-Marc Moura)已有过较为详尽的理论介绍,保尔·利科(Paul Ricoeur)也在其关于集体想像物的论证中有过阐述。法国著名学者巴柔(Daniel-Henri Pageaux)这样说道:“‘我’注视他者,而他者形象也传递了‘我’这个注视者、言说者、书写者的某种形象”<sup>[1]157</sup>。作为集体想像物,形象无所谓真实还是虚假。异国形象创造是一个借助他者对自我文化身份加以确认的过程,是一个有意无意的文化利己过程。无论是意识形态形象创造还是乌托邦式形象创造,创造本身都体现出了创造者在整合与颠覆作用之间所做出的文化选择。意识形态的整合作用表现在对异己文化的消融和对己文化优越性的确立。而乌托邦的颠覆作用并不意味着对己文化的全盘推翻,而是以优异文化为蓝本对己文化中不合理之处进行颠覆整改。本文旨在对西方的中国形象构建过程中这两种倾向的体现进行研究,并通过对这两种形式的形象构建过程的分析,揭露这两种倾向本质上的文化利己性。

### 一、形象建构中的意识形态和乌托邦倾向

首先,一种异国形象的产生是否是属于意识形

态,关键在于看其是否对特定的群体起到整合功能。意识形态对形象进行相异性整合,接着就会出现认同性,以此再次强化本群体的身份,即“它使人们从该群体关于自身的起源、身份,并使其确信自我在世界史中地位的观点出发去读解异国。其目的是使想像出的本群体的身份支配被描写的相异性”<sup>[2]33</sup>。从常理分析,我们可以把意识形态的观察者称作本国中心,因为他们往往对自我群体或是本国文化充满自信,所以当论及某些异国形象时,他们便会一边发掘出与自我群体相似的文化成分,一边对相异性进行整合,以改造为目的对相异成分进行建构,从而产生认同,并达到归化异国的目的。

与意识形态不同,乌托邦的本质并不在于倡导自身文化的优越性,而在于通过效仿异国文化而达成自我文化的完善。持乌托邦倾向的人对异国形象的感知通常存在于对自身文化消极看待的前提下。我们可以大胆的称之为“他国憧憬”。因为这些观察者倾向于对他国文化的憧憬而发掘出优异或是所谓优异的成分,甚至不惜背离自身文化观念,从而试图通过借鉴他者而完善自我文化。所以本文认为相对于意识形态的整合功能,乌托邦具有的是社会颠覆功能。正如莫哈谈到的那样,“从形象为建立一个相异性而背离自身文化观念上说,这是一个颠

[收稿日期] 2010-04-02

[作者简介] 俞 博(1982-)男,硕士,电子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教师。

覆性形象”<sup>[2] 34</sup>。其实这种文化观念就具有乌托邦式的倾向。

但是,就异国形象的本质及其形成过程来看,意识形态和乌托邦都是来自于现实又超越了现实。作为两种不同的异国形象构建倾向,它们有着自己特有的功能和作用方式。虽然最初可能是由少数人提出,但最终常常能够为某一群体所接受,那就是因为特有的功能和作用方式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这一条件下异国形象的个体建构者及所属群体的需求。

## 二、中国作为他者被构建的乌托邦和意识形态形象

中国作为西方观察者心中的东方异国被赋予了各种不同的形象。中世纪旅行家马可·波罗就为西方描绘了一个乌托邦式的中国形象。他口述的《马可·波罗游记》生动地描绘和塑造了一个强盛的中华帝国,那儿有着金碧辉煌的宫殿,豪华的庆典。还描述了当时的一些繁华的城市如大都(今北京)、西安、开封、南京、扬州、苏州、杭州等等。他对大都的繁华感到惊讶,对杭州西湖的美景与其文人墨客的诗情画意赞叹不已。他塑造的乌托邦式的中国形象更是激起了西方人的遐想,他们怀揣着对中国的憧憬和梦想,谈论和构想着这个理想化、充满异国情调的东方国度,其中有不少人带着亲自探寻的目的踏上了漫漫旅途。哥伦布就是带着西班牙女王给中国皇帝的信而开始了他那次“发现新大陆”的航行的。从16世纪起,大量中国古代文化典籍通过传教士进入欧洲。启蒙时代西方社会文化生活中普遍出现了一种崇拜中国的思潮,人称“中国热”。“中国热”始于1650年前后,结束于1750年左右。一个世纪间,“中国热”表现在社会物质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从高深玄妙的哲学、严肃沉重的政治到轻松愉快的艺术与娱乐。孔夫子的道德哲学、中华帝国的悠久历史、汉语的普世意义,中国的瓷器、丝织品、茶叶、漆器,中国工艺的装饰风格、园林艺术、诗与戏剧,一时都进入了西方人的生活,成为他们谈论的话题、模仿的对象与创造的灵感,中国形象为他们展示了梦寐以求的幸福生活的前景。英国作家哥尔史密斯在《世界公民》一书中也塑造了理想的中国形象,从中可以看出中国是一个最古老文明的国度,在那里统治者开明、百姓安居乐业、法律惩恶扬善、社会道德情操高尚<sup>①</sup>。虽然哥尔史密斯对中国的描写同样不是十分客观,他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也是片面的,但他对中国的这种乌托邦式形

象的创造是为了抨击英国的时弊,向读者展现了一个在很多方面都优于英国,楷模似的中国形象。尽管当时的中国并非好到这种程度,但他在书中对中国的极尽夸赞之词却造就了一个完美的中国形象,一个文明富庶、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治理有方,令人向往的乌托邦,以此来激发英国人的智慧和改革的决心。

随着西方世界与中国交往的逐步加深,经济、文化、政治的交汇和冲突使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形象构建逐步丰富起来。在各种心态的驱使下,意识形态式的中国形象也同时形成,这种形成有其独特的意义。萨义德在《东方主义》中提到“东方几乎是被欧洲(西方)凭空创造出来的地方,自古以来就代表罗曼司、异国情调……非凡经历。现在,它正一天一天地消失”<sup>[3] 1</sup>。虽然本书关注的更多的是伊斯兰东方,而事实上,中国形象的衰退开始得更早。尽管没有太多事实依据,丹尼尔·笛福在《鲁滨逊漂流记续》中塑造的中国形象开始了西方对中国负面形象的描写。他把中国人称为文明的野蛮人。他对中国的诸多负面描写可谓到了极尽苛刻的程度,他认为中国人贫困、奸诈、怯弱、愚昧无知而又自以为是。中国的宫殿、城市、港口与西方无法相比,贸易与西方相比也相差甚远。尽管中国有过浑天仪,但对天体运动知之甚少。中国的官员爱慕虚荣、腐败贪婪。中国的军队装备落后、纪律涣散,士兵贪生怕死,毫无战斗力可言<sup>②</sup>。18世纪末到19世纪,西方的科学技术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工业和航海业都有很大的进步,来到中国的外国人也越来越多,等他们到了中国后发现中国当时的情况与过去的理想状况大相径庭,所以他们最初对中国抱有的幻想逐一破灭,甚至走向了另一个极端。19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面目全非,西方在观念上疏远中国、文化上批判中国。传教士杜利特于1850年五月来到中国,他筹办和编写了一些关于中国社会生活的刊物和书籍,比如《中国邮报》和《中国人的社会生活》等。他明确指出中国需要西方的改进,他认为中国人“禁锢于传统的迷信和偶像崇拜之中,中国社会肉欲横流,风气败坏。”他通过对中国人精神信仰的批判进而提出在中国传教,强调使中国人皈依耶稣是十分重要的,他感叹到,“中国人是多么地需要圣经的光辉来照亮他们黑暗的心灵啊”<sup>③</sup>。

提到十九世纪后半期对中国研究的传教士及其著作,我们就不能忽略明恩溥和他写的《中国人的气质》。他深入中国乡村,认为在乡村中能够比在城市里更好地了解中国和中国人的性格。他声称他写作本书的目的是从客观的角度描写中国。他在书中

对中国进行了详细的描写,我们可以总结出他描绘的中国人的特点:1)爱面子;2)节俭;3)吃苦;4)礼貌;5)无时间观念;6)无效率;7)理解能力低下;8)做事拐弯抹角;9)油滑;10)内心复杂;11)无情;12)排外;13)无公德心;14)保守;15)冷漠;16)精力充沛;17)耐心;18)知足;19)孝顺;20)仁慈;21)没有同情心;22)社会动荡;23)守法;24)猜疑;25)虚假;26)多神论和无神论者<sup>④</sup>;在这些描述中,多数特点是属于负面性质的。在他看来,中国人虽然有一些优点,但难以掩饰他们丑恶的本质。在这本书的最后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句子,“为了革新,我们应该找到和净化中国人性格的源头,中国人的灵魂、家庭和社会都需要改变,只有基督文明才能永久而且完整地满足这种迫切的要求”<sup>[4]329-330</sup>。也许他写这本书的初衷的确如他所言,是为了客观的介绍中国和中国的的问题。当论及中国问题的解决办法时,他首先想到了国际力量和基督教义。可见中国在他心目中与西方国家相比处于劣势,而他们拥有更优越的文化和信仰,只有中国人接受了这些教义后才能得到改善。

### 三、西方构建中国形象背后的文化心态

本文上一部分对西方构建的乌托邦式和意识形态式的中国形象进行了简述。从中可以看出,在与中国的交流中,西方人看中国的角度和目的是不同的。虽然他们在最开始描述中国的时候还不知道中国的状况,但是在构建中国形象的时候却明显带有美好的憧憬。而这些形象构建者自身其实也清楚自己的描述并不准确,但他们还是积极地营造和宣扬这种乌托邦式的中国。这种形象并不真实,但也不能简单地被看成是虚假的。其实这些构建者是自己对本国现状和己文化的美好希望移植到了他们创造的中国形象当中,所以他们对中国表示崇敬,甚至带着寻梦的目的,向梦想中的乌托邦前进,希望通过与中国的交往使自己不断强大起来。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当异国形象创造者对自我文化产生怀疑和不自信时,往往会求助于异文化对己文化进行反驳,从而实现自我文化的强化作用,以期获得自我文化的认同与超越。

随着接触的扩大和了解的加深,政治、经济、文化尤其是利益的冲突使得西方人构建中国形象的倾向不断向意识形态转变,他们潜意识中已经开始以一种自上而下的眼光来看待中国。正如萨义德写道:“东方被观看,……而欧洲则是看客,用其感受力居高临下地巡视着东方”<sup>[3]135</sup>。他们开始以西方

现实衡量和批判中国,同时他们膨胀的自我中心意识和在文化、经济方面的各种目的开始引导他们创造出粗鄙低劣的中国形象。对他们而言,这种形象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向证明了西方文化的优越性,而优越文化改进低劣文化似乎是理所当然的,由此间接证明了殖民扩张的合理性。文学家、政客、哲学家、商人和传教士再三强调中国人道德败落、心灵阴暗,由此证明改造拯救中国人是顺应天命,他们分析中国落后的社会结构和专制的政治制度及停滞不前的历史,为西方的政治扩张提供借口,鼓吹中国人种族低劣,为所谓的文明征服寻找借口。但是,历史永远能够清楚的告诉我们:打着这些旗号的西方人给中国带来了什么,同时又带走了什么!

我们可以看出,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的整合功能和颠覆功能在以上两种形象建构过程中展露无疑。其实西方观察者构建的中国形象,不论是乌托邦还是意识形态,从中表现的都是西方。“其文化功能都在于构筑一个与西方现实差异甚至相反的他者,无所谓认识也无所谓真实。作为文化他者的功能在于,确立一种与西方中心的二元对立的世界观念秩序,完成西方文化的自我超越或自我认同,改造世界或改造自我”<sup>[5]18</sup>。所以本文可以认为不管是乌托邦还是意识形态形象都是形象构建者基于自我文化语境和自身文化需要而创造出来的想像物。整个形象建构过程中既有异国现实的反映,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本国文化发展的需要。在异国形象建构过程当中,既然构建者有意或无意地带有利己倾向,所以他们也会有意或无意地依附于己文化,参照己文化来审视异国文化。“人人都从某个文化居室的窗后观看世界,人人都倾向于视异国人为特殊,而以本国的特征为主臬”<sup>[6]334</sup>。形象构建者在为了迎合自身或其身处群体的需要而强化自我文化的前提下进行异国形象构建,所以在创造过程中出现现实差异和对异文化的误读是不可避免的。无论是在异国形象的构建过程中的建构者还是被建构者都应该认识到乌托邦式的形象或意识形态式的形象的本质。它们本身就只是一种社会想象,是一种关于他者的文化表述,不可能追求绝对的实事求是,它只反映了形象建构者的文化心理,而这种文化心理归根到底还是基于利己主义的。

总之,“他者”的形象,不论是乌托邦式还是意识形态式的,从中表现的都是观察者,都在于构筑一个与现实差异甚至相反的“他者”,从而确立一种与自己相对立的文化形象,通过这种形象完成自我超越或自我认同,从而改造自我或改造世界。这种形象创造是伴随文化交流一直存在的。每种文化都

有其值得推崇的地方,不同文化间的交往有助于相互学习、促进了解,而在文化交往过程中,出于一种实现自我的利己目的,误读是肯定会与交往相伴而生的,但文化交流不会停止,对某一他者的形象构建也会长期不断地在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之间左右摇摆,而我们要做的就是认清各种形象建构背后的真实目的,只有这样才能很好地把握文化交流的方向。

### 注释

① 参见杜平在其论文“异国形象创造与文化认同”对此问题的引述。见《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4年第5期,第29页。

② 参见姜智芹在其论文“颠覆与维护-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透视”中关于此作品的引论。见《东南学术》2005年第1期,第120页。

③ 转引自Suzanne Wilson Barnett对杜利特(Dulittle)的著作《中国人的社会生活》Social Life of the Chinese的引用。见Barnett, Suzanne Wilson. “Justus Doolittle at Foochow: Christian Values in the Treaty Ports” in Barnett, Suzanne Wilson & Fairbank, John King eds. Christianity in China: Early Protestant Missionary Writings. Cambridge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115-116.

④ 该书分为26章,这些特点就分布在各个章节之中。详见Smith, Arthur.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M]. New York: Fleming H. Revell Company, 1894.

### 参考文献

- [1] 达尼埃尔·亨利·巴柔. 形象[M]. 载孟华.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 [2] 让·马克·莫哈. 文学形象学的研究史及方法论[M]. 载孟华.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 [3] 爱德华·W·萨义德. 东方学[M]. 北京: 三联书店, 1999.
- [4] SMITH A.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M]. New York: Fleming H. Revell Company, 1894.
- [5] 周宁. 乌托邦与意识形态之间: 七百年来西方中国观的两个极端[J]. 学术月刊, 2005, (8): 11-18.
- [6] 莱恩·T·塞格尔斯. 文化身份的重要性[A]. 乐黛云, 张辉. 文化传递与文学形象[C].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327-344.
- [7] 杜平. 异国形象创造与文化认同[J]. 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 2004, (5): 27-29.
- [8] 姜智芹. 颠覆与维护-英国文学中的中国形象透视[J]. 东南学术, 2005, (1): 117-122.
- [9] BARNETT S W. “Justus Doolittle at Foochow: Christian Values in the Treaty Ports” [A]. BARNETT S W, FAIRBANK J K eds. Christianity in China: Early Protestant Missionary Writings[C]. Cambridge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107-119.
- [10] ISSACS, H R. Scratches on Our minds: American Views of China and India [M]. New York: M.E.Sharpe, Inc, 1980.

## Ideology and Utopia: On Westerners' Construction of the Image of China as the “Other”

YU Bo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Chengdu 610054 China)

**Abstract** In image studies, the formation of foreign images is a process of self-realization and self-confirmation of a certain cultural identity, which is achieved by means of the descriptions of others. There are two kinds of tendency in the formation of foreign images: ideology and utopia. They are essentially social imaginations and cultural statements of others, which cannot be completely exact but just inflect the views and thoughts of foreign-image builders. A kind of cultural egoism is always embodied in these views and thoughts. In addition, this cultural egoism also can be found in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Western image of China.

**Key words** foreign images; ideology; utopia; egoism

编辑 戴鲜宁